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08

# 人类世权力话语的建构——论21世纪西方气候小说的中国形象

姜礼福<sup>1</sup>, 孟庆粉<sup>2</sup>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在21世纪,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气候变化小说则是这一场域的重要载体。西方作家通过三种策略,建构了西方主导的、关于中国的人类世权力话语,即把气候变化全球问题“中国化”、气候变化“中国问题”政治化以及将中国历史文化符号化。这三种策略形成一种连环结构,将中国形象定格在西方话语谱系之中。对21世纪以来西方气候小说中的中国元素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其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中套”,深刻把握西方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意图,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而且可以反思人类世问题,探索走出人类世困境的正确路径。

**关键词:**人类世;气候变化;气候小说;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053-06

中国形象近年来已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相关研究大多关注21世纪之前的文学经典,聚焦于“昨日中国”形象的再现,较少关注新世纪以降的“今日中国”或“明日中国”形象。在批评话语方面,国内一批学者致力于形象学方法论的建构,有效推动了形象学研究,但依然留有缺憾。有学者指出,当下国内的相关研究“问题意识不清晰,缺乏从形象学研究去回应时代命题能力”<sup>①</sup>。在当今世界,何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形象学研究又应作何呼应?新世纪西方勃兴的人类世气候小说(cli-fi)为回应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素材。

荷兰大气化学家克鲁岑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表明,地球已进入人类对地球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新的地质时期,其核心表征即为全球气候变化,这是自然科学界对地球“历史方位”的最新判断<sup>②</sup>,也是当今地球最大的现实。杨金才认为,21世纪外国文学“追寻与审

视历史进程……致力于某种再想象”<sup>③</sup>,气候小说就是对人类世这一地球历史进程和现实的想象。“气候变化谁之过”“气候问题出路在哪”“人类文明路在何方”等“人类世之问”成为西方作家创作的重要母题。值得关注的是,西方作家往往在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体现出对中国在气候变化的产生、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作用的思考。自20世纪末,气候变化问题已由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战场。在应对气候问题上,中国立场鲜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原则。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在根本上涉及人类世话语建构的问题,这将对新的国际秩序形塑产生重要影响。谁在人类世话语建构中占据主动,也就将在气候变化谈判和应对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将有助于把握21世纪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本文基于多部西方人类世气候小说,深入考察其中的中国元素,涉及的小说包括美国作家罗

收稿日期:2020-08-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28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6WXB00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0SJA0189)

作者简介:姜礼福(1979—),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人类世批评研究。

①周云龙:《比较文学形象学:成绩与反思(2014-2018)》,《国际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

②姜礼福:《“人类世”概念考辨:从地质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③杨金才:《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首都科幻三部曲”、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救世女孩》(*The Caryatids*, 2009)、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水刀》(*The Water Knife*, 2015),以及侨居英国的澳籍作家葛拉斯(Matthew Glass)的《最后通牒》(*Ultimatum*, 2009)等。论文重点关注上述小说刻画的中国形象、体现出的对中国的态度,揭示其中国书写的真实意图和深层动因,这也正是气候小说国外研究的盲区所在。

### 一 气候问题“中国化”:污名化和理想化两个面向

根据形象学的观点,一切形象的设定都隐含着情感趋向,总是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为逻辑起点,而这两种情感趋向又都同现实紧密相关:“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sup>①</sup>。在气候小说中,西方作家尤为关注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产生、应对中的角色和作用,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呈现为污名化和理想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充满着西方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内涵。

污名化中国主要是指作家在作品中将中国塑造为气候问题的麻烦制造者、责任逃避者和应对不力者。在多部气候小说中,叙事者都将全球气候的变化和危机主要归咎于中国,将全球气候治理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认为中国是气候灾难的罪魁祸首。这在葛拉斯的《最后通牒》中尤为明显。作家将故事设定在2032年,在气候灾难中,美国被塑造为正面形象,而中国是典型的反面角色。彼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碳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但却毫无国际责任意识,拒绝为气候问题买单。谈判中,中国政府缺乏诚意,故意逃避拖延,出尔反尔,无视美国提出的“碳减排”协议<sup>②</sup>,并最终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故事以美国“让出”台湾,中国签署协议收尾。《最后通牒》借助气候议题,鼓吹“中国威胁论”,核战争成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最终爆发。这是西方对不断强大的中国焦虑不安的真实写照。另外,罗宾逊的“首都科幻三部曲”中还将中国塑造为缺

乏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的国家。小说在呈现华盛顿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的同时,阐发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性。“漠视气候变化”的中国陷入“发展死结”,在美国救援下才勉强缓解。小说恍若西方“中国崩溃论”的虚构论证。两位作家都对“气候变化谁之过”的“人类世之问”进行了思考,而结果都是无例外地将责任推卸给中国,完全无视在现实中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这是典型的颠倒黑白、扭曲事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偏见和傲慢”<sup>③</sup>。

当然,也有西方作家走向污名化中国的对立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故意美化中国,将中国理想化为气候灾难的救赎者和人类物种与文明存续的希冀。

一方面,中国被描述为气候问题的积极应对者和绿色低碳技术的革新者。巴奇加卢皮的气候小说《水刀》将故事置于2030年代,从现实和想象两个层面呈现中国形象。在“近未来”现实中,中国积极开展气候治理,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科技,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态建筑建设技术;在大干旱肆虐的美国西南部,中国生态建筑公司建造的“柏树特区”“泰阳特区”,可以抵御沙尘,保障清洁空气、淡水的供应,为中上层阶级提供避难所。在想象层面,遥远的中国因其先进的技术和适宜人居的环境,成为气候难民梦寐以求的“应许之地”。在气候剧变情境之下,中国成为应对灾难性环境的技术先行者,小说充溢着马可·波罗式的东方主义浪漫。

另一方面,中国在气候灾难中成为人类物种和地球文明延续的火种。人类世时代意味着地球系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作家的后人类世想象则指向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现代工业文明的湮灭。斯特林的《救世女孩》发生在2065年,工业文明和地球生态系统已崩溃;除中国外所有国家都已解体,灾难中幸存的人类聚集在原有的维也纳、洛杉矶和甘肃地区;在外太空探索、地球工程建设和新文明形态发展方面取得旷世成就的中国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中国宇航员登陆火星,在其地表深层“发现6种处于休眠状态的活体微生

①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续)》,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2期。

②Glass, Matthew. *Ultimatum*.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9, p. 86.

③姜礼福:《气候变化小说的前世今生——兼谈人类世气候批评》,《鄱阳湖学刊》2020年第4期。

物”,并将其成功带回地球<sup>①</sup>,为火星开发作准备。而且,中国以甘肃酒泉为中心,建成“面积38平方公里零碳足迹的新兴沙漠都市”,成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sup>②</sup>;所有人生活在“类似于密封的泡泡中”,水和空气实现内循环,成为“地球上最先进城区”和“可持续生存的成功范例”<sup>③</sup>。中国凭借先进的基因技术,复制冰封在永冻土的猛犸象,开启新的生命;通过培育新型微生物把“人体转换为能量工厂”,彻底解决饥饿问题;利用“编辑基因数据库”<sup>④</sup>和遥感网络人体扫描技术抑制一切病毒入侵,消灭人类疾病,推动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

可以说,西方人类世作家以叙事的方式审视中国在气候灾难产生、气候政治谈判、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一方面,把中国描写成导致气候灾难的“邪恶之邦”,另一方面把中国想象为代替美国“山巅之城”的“幸福之乡”,但两种形象都凸显出中国作为迥异于西方的他者存在,蕴含着特定的情感趋向。

## 二 “中国问题”政治化:中国西藏和台湾形象再现

气候变化本应是世界性议题,但西方作家将这一问题“中国化”,形成了一种气候变化“成也中国、败也中国”的话语模式,对中国进行了人类世话语的“挟持”。不仅如此,西方作家还沿着“气候问题中国化”的思路,把这一问题政治化,进一步“套牢中国”,将政治问题裹挟在气候问题之中。气候问题政治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小说中关于中国西藏和台湾形象的塑造。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方文学中的西藏书写大多涉及主权归属问题。20世纪之前的西方作品大多将西藏视作中国的一个省份,或者至少承认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但20世纪中期以后,西藏往往被塑造为一个受到“中国侵略”的“国家”<sup>⑤</sup>,作家“企图垄断……有关西

藏知识的话语权”<sup>⑥</sup>,并将西藏所谓的国家地位“刻板化”,这一价值取向在罗宾逊的“首都科幻三部曲”中得以延续和强化。

罗宾逊的“首都科幻三部曲”表面上是在“近未来”美国华盛顿遭受气候突变的故事。但在叙事中,作家时不时把读者拉回历史语境,并非美国史,而是新中国的历史;作者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和西藏之间的整个关系变迁史,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故事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美国华盛顿遭受并应对气候灾难的过程,另一条是西藏僧侣逃离西藏、建立岛国,在气候变化中岛国被淹没,又试图重返西藏的故事。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互为补充,显性的气候叙事裹挟着不断强化的藏独思想的隐性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借助气候变化的叙事形式和外壳,宣扬的是以藏独为本质的所谓“自由”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误导性。

罗宾逊的气候变化叙事充斥着对中国西藏的主观臆造和东方主义式的傲慢,作家通过人物之口,歪曲事实真相,捏造历史,抹黑中国,如捏造中国政府迫害西藏僧侣、插手藏传佛教转世灵童认定、监禁班禅喇嘛、干涉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等行为。在小说开篇,来自凯姆柏伦的“僧侣”被塑造成1950年中国“入侵”西藏的受害者<sup>⑦</sup>,因无法忍受“迫害”而自我放逐。叙事伊始就将新中国之后的西藏解放歪曲为“入侵”,且否定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其中的藏独思想暴露无遗,并随着故事情节发展不断强化,具体呈现为借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合法性问题刻意抹黑中国政府并大肆宣扬达赖喇嘛。在活佛转世中,“金瓶掣签”是合法途径,其他任何形式皆违背藏族传统和中国相关法规。另外,达赖是长期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但作家却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世界情怀的、为人谦和的宗教领袖形象,其政治意图不言自明。不仅如此,达赖也成为在美国扶持

①Sterling, Bruce. *The Caryatids*. New York: Del Rey, 2009, p. 235.

②Sterling, Bruce. *The Caryatids*. New York: Del Rey, 2009, p. 221.

③Sterling, Bruce. *The Caryatids*. New York: Del Rey, 2009, pp. 221-222.

④Sterling, Bruce. *The Caryatids*. New York: Del Rey, 2009, p. 258.

⑤韩小梅:《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西藏形象的政治化书写》,《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

⑥胡刚:《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媒体中的中国西藏形象》,《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⑦Robinson, Kim Stanley. *Forty Signs of Rain*.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4, p. 1.

下同中国开展气候谈判的“政治领袖”。在日趋严重的气候灾难中,中国被迫同美国扶持的达赖开展谈判。美国的绿色生态技术成为美国、达赖同中国开展谈判的筹码。经谈判,美方许诺提供一切可能的“科学和技术支持”,并派出核潜艇代替烧煤发电厂<sup>①</sup>。中方一方面许诺持续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和达赖喇嘛达成和解,给予西藏真正意义的“自治民族区”的行政地位<sup>②</sup>。这无异于承认了西藏的独立地位,这种描写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纯粹是西方一厢情愿。可以说,“首都科幻三部曲”将气候变化和政治问题杂糅在一起,将西藏同中国割裂开来,捏造了中国和西藏关系从军事入侵到政治干涉再到分治独立的三阶段,反映出作家借由气候变化问题实现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臆想。

与西藏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拉斯在2009年的《最后通牒》中对台湾的刻画。同西藏一样,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战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但在《最后通牒》中,面对严峻的气候灾难,美国被塑造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救世形象。出于全球气候安全考虑,美国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已成为超级大国的中国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并趁机“占领”台湾。为换取中国对美国提出的碳减排协议的支持,美方决定放弃对中国的军事报复,并且接受了中国收复台湾的现实。这样的情节安排暗含着葛拉斯的叙事陷阱。美国总统关键时刻在军事上的示弱与中国军事的咄咄逼人形成鲜明对比。两国在国际上的道义和声誉立判高下,美国“失去了台湾”,却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袖,成为“正义”的化身,赢得了世界,中国收复了台湾,却“失去”了世界。这故事的陷阱在于,把中国台湾“问题”与气候应对的责任问题杂糅起来,致使中国陷入不仁不义、失道寡助的道德窘境,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构陷。

由上分析可知,气候变化小说中的中国书写

往往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西方作家不露痕迹地“夹带私货”或赤裸裸地颠倒黑白,沿着“气候问题中国化—‘中国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复杂化”的思路,不仅悄然地将全球性问题变成中国问题,而且将这一所谓的中国问题政治化、复杂化,使中国陷入政治伦理丧失和国家道德赤字之中,从政治源头上进一步确认了气候问题的中国责任,体现了西方作家自身的“无知、高傲或居心叵测”<sup>③</sup>,尤其需要警惕。

### 三 超越气候政治的话语认同:中国形象符号化

西方作家通过气候问题中国化的两个面向编造“中国过错”的欺世谎言、炮制“中国出路”的糖衣炮弹,通过气候问题政治化让读者在无意间陷入叙事陷阱之中并接受其预设。不仅如此,西方作家还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呈现,使中国读者沉醉于中华历史文明记忆之中,从而坠入西方作家编织的复杂的人类世话语体系之网。

斯特林的《救世女孩》第三部分聚焦中国,集中再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符号化书写。该部分从欧洲克隆人索尼娅的视角展开。在气候灾难中,中国成为唯一幸存的国家。为了人类和文明的延续,索尼娅和贝德莱特组成“蝎子战队”,游弋于荒漠中,清除对中国地区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索尼娅非常珍视中国文化,熟稔中国历史,并且将中国历史文化内化在言行中。首先是小说中索尼娅对唐诗宋词的使用。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粹,也是人类文明的华章。在气候灾难肆虐的人类世时代,全球人口迅速下降,世界濒临湮灭,处处哀鸿遍野,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故事中,索尼娅不仅成为诸多中国人的救星,被视作“哈尔滨天使”,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她看来,城市可以被摧毁,国家可能湮灭,而“背诵下来的诗词是不会被焚烧或偷窃的财富”<sup>④</sup>。她在为贝德莱特疗伤时,开始吟唱唐代诗人李贺的《猛虎行》;当陷入死亡困境时,她又开始“用中文吟唱”《水调歌头

①Robinson, Kim Stanley. *Sixty Days and Counting*.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7, p. 511.

②Robinson, Kim Stanley. *Sixty Days and Counting*.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7, p. 512.

③姜礼福,孟庆粉:《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④Sterling, Bruce. *The Caryatids*. California: Del Rey, 2009, p. 219.

·明月几时有》<sup>①</sup>。克隆人索尼娅的使命不仅表现在救世、保证人类的存续,而且在于挽救人类文明和文化。作家把诗词全文完整地嵌入叙事中,富有深意,对于西方读者产生陌生化效果,而对中国读者而言则会形成较强的认同效应。西方克隆人对东方优秀文化的珍视,传达的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理念,体现出“世界主义”精神。这貌似超越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牢笼,实则把中国符号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中,服务于西方把握人类世权力话语的现实主义目的。

其次,索尼娅对中国历史熟稔在心,并使用了具有特定历史语境或中国特色式的话语。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包括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璀璨的文明成果,包括兵马俑、长城、唐三彩以及古丝绸之路等无一不被提及。不是借古讽今,而是“观今叹古”。在气候灾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人类辉煌的历史变得遥远而陌生。后人类世新的生存环境总能触发索尼娅对“全新世”中国的记忆。她时不时将“后人类世”语境下的中国同人类世或全新世时代的中国进行对比。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中国在地下秘密基地开展人体克隆计划,当秘密揭开,索尼娅将这些克隆人比作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当索尼娅穿越戈壁滩,清除潜在威胁势力时,她和贝德莱特乘坐的机器坐骑又让她联想到唐代的“陶俑马”;当中国的载人飞船登陆火星并成功返航时,叙述者感叹到:“一百年前,伟大的舵手——毛泽东选择了甘肃省酒泉,蒙古边界的戈壁滩作为共产主义未来的发源地。这是中国航天征服太空的地方。”<sup>②</sup>

《救世女孩》中涉及的中国文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极具代表性,具有“符号”意义,横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易于形成一种话语认同。小说对中国的多维再现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中国声音和中国主体性,其中的中国人物、中国历史、文化形象全部以静态的形式出现,是被表述和言说的对象。这种符号化想象承载着西方对中国璀璨的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的深刻记忆及其产生的心理冲击,更重要的是传达着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精华的“知识占有”和精准把控。作家通过将具有代表性的历

史、文化和人物符号浓缩于一部作品,展示出对中国话语的驾驭和掌控能力,旨在将中国书写纳入西方人类世话语体系,暗示着曾经塑造了璀璨文明和文化的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被寄予更多期望,进而理应承担更多责任的现实意图,这本质上服务于西方试图主导人类世话语权力之目的。

## 结语

总之,西方作家在人类世小说中,通过三种策略将中国元素融入气候叙事中,成为响应“人类世之问”的连环扣。一是基于未来视域,将复杂的全球气候问题“中国化”、扁平化,通过污名化和美化两个层面,突出“中国过错”和“中国救赎”,把气候变化这一世界问题变成中国问题。二是通过历史和未来的穿越交织,将气候变化这一所谓的“中国问题”政治化,把复杂的气候问题和最敏感的西藏、台湾书写杂糅在一起,使其难分难解,被扁平的气候问题再次复杂化,让读者从阅读伊始便已进入作家安排的叙事陷阱,由此强化了气候问题的“中国化”。三是立足中国历史,西方作家将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符号”融入叙事,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强化中国历史责任的意图昭然若揭。

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从未像 21 世纪这样如此“关注”中国。西方人类世小说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是回应“人类世之问”的重要层面,涉及气候变化问题谁之过、气候变化问题的出路等重大现实问题;在小说中,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化两种趋势并存激荡,看似矛盾,实质上具有内在同质同构性,影射着西方掌控 21 世纪人类世话语主动权的战略意图,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在将中国妖魔化、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替西方国家推诿责任,试图继续维护、巩固西方的主体性和现代性话语权力。另一方面,褒扬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奇迹”对西方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促使西方形成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集体无意识,而通过乌托邦化中国,试图在自我颠覆中实现西方现代困境的自我超越,同时把气候问题推向中国,指向中国

<sup>①</sup>Sterling, Bruce. *The Caryatids*. California: Del Rey, 2009, p. 238.

<sup>②</sup>Sterling, Bruce. *The Caryatids*. California: Del Rey, 2009, p. 225.

应承担更大责任和义务的意图,使读者过高期待中国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无法客观、理性地对待和评价中国。正如周宁所言,中国形象话语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空间的扩散性和时间的延续性”<sup>①</sup>,对国家形象造成深远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对西方人类世小说中国形象的研究,“体现阐释西方‘气候故事’的中国立场”<sup>②</sup>,揭示

西方作家歪曲中国的真实意图,并对其进行剖析和批判,而且也要呼吁中国作家关注气候变化问题,通过创作优秀的气候小说,客观、真实地呈现中国,“讲好人类世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实现中国“文学影响与作用的人民性”<sup>③</sup>,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也将助力人类最终摆脱人类世困境。

##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Discourse in the Anthropocene: On China Image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Western Climate-fiction

JIANG Li-fu<sup>1</sup> & MENG Qing-fen<sup>2</sup>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e issue of the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the ideological battlefield with the climate-fiction serving as pivotal vehicles. Western writers construct the Anthropocene discursive power about China by means of three strategies, that is, firstly, narrowing the global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down into a “Chinese issue”; secondly, politicalizing the so-called “Chinese issue”, and thirdly, signifying crucial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vents. Taken together, these strategies form a chain structure, which constrains China image in Western discourse, aiming to produce a universal Anthropocene discursive mechanism. It is believed that hav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China image in the Anthropocene climate-fiction and exploring the trap-in-trap within it will shed light on the inner mechanism and fundamental purpose of westerners’ imagining China. What’s more, it will help to better China image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Anthropocene predicament.

**Key words:** Anthropocene; climate change; climate-fiction; China image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周宁:《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七百年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

②姜礼福:《气候变化小说的前世今生——兼谈人类世气候批评》,《鄱阳湖学刊》2020年第4期。

③范钦林:《当代文学的人民性新论》,《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